

好生活与脆弱性

——阿伦特和纳斯鲍姆相关思想论述

叶晓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好生活”向来是伦理学探讨的一个主题。阿伦特认为好生活就是在人类事务领域通过行动和言说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和卓越性,而纳斯鲍姆认为,好生活是通过行动把潜在的美德实现出来与通过在城邦中过政治生活和与另一个人进入友爱关系来繁荣自己的人性。但是“好生活”又往往与脆弱性相连,在阿伦特那里,这一脆弱性源于行动的三重困难;而在纳斯鲍姆那里,则是由于受到运气的影响。两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源于她们对理性主义最深沉动机的批判。而她们的思想,在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弥漫的当今社会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激励意义。

关键词:阿伦特;纳斯鲍姆;好生活;脆弱性;行动;运气

中图分类号: B0; B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6)04-0100-09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出身于德国汉诺威,曾经流亡巴黎,后到美国,是一位犹太裔的女性政治哲学家,历经纳粹的迫害和逃亡,她的经历体现了20世纪的苦难史。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1947年出生于美国,如今仍然活跃在美国思想界,被美国《外交政策》与英国《展望》两次列入“世界百名杰出知识分子”,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评其为“我们时代十二位伟大思想家”。这两人的生活轨迹没有什么交集,但是在阅读她们著作的过程中,却能发现她们的思想有所交汇,尤其是对“脆弱性”问题的论述上。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两位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并由此提出对我们的一些启示。

在阿伦特的视野中,与脆弱性相连的是人类事务领域,即由行动与言说构成的政治生活领域,“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并为人类共同体所必需的活动,只有两种被看作是政治的并构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即行动和言说,从这两者中产生出了人类事务的领域,而一切仅仅是必需的和有用的东西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外。”^{[1]16}这段引文,除了阐明行动和言说产生了人类事务领域,也隐含了阿伦特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产生必需品的劳动和生产有用物的工作都被排除在人类事务领域之外。

阿伦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是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不是单个的人(man),而是复数的人们(men)生活在地球上,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境况。换言之,人是复数性(plurality)的存在,他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在场,才能显现出自己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而无论是劳动,还是工作,都不需要他人的在场就能完成。先说劳动,劳动对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活,不管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还是人自身的生产,都受制于必然性,即使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参与而完成的劳动,也不过是以同一性为基础,在其中体现不了任何

人的个性。而工作,则是技艺人孤独地面对自然界生产出产品,从而为人类在地球上建造一个人为的对象世界,它也无需他人的在场,甚至需要与他人隔绝。无论是劳动还是工作,都不是对应人的复数性,都不需要与他人共在才能完成。但是,在阿伦特看来,如果没有他人的在场,个体的独特性、卓越性都得不到展示,而人之为人,就是要体现这种独特性和卓越性。因而,阿伦特提出“行动”的理论,为的是使人的独特性和卓越性得以呈现。

行动者与劳动者和技艺人不一样,他需要在言行中彰显自己,通过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这种切入,阿伦特把它比喻成“人的第二次诞生”。人的第一次诞生是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而第二次诞生就是通过言说和行动向世界彰显我是“谁”。诞生,意味着“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1]139}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开端、行动、诞生有着类似的含义,行动作为“开端”相应于诞生的事实,它是诞生性的人之境况的现实化。通过行动和言说,人们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网,这个人际关系网虽然是无形的,却一点也不比可见的事物世界不真实,它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严格来说,人类事务的领域由人际关系网组成,这个网络存在于任何人们一起生活的地方。”^{[1]144}

但这个无所不在的人类事务领域却与脆弱性紧紧相连,这一脆弱性源于行动的三重困难,那就是:过程的不可逆转性、结果的不可预见性以及作者的匿名性。^{[1]171}行动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发生在复数性的人之境况之中的行动,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独特性,它不可能被统一到一个模式当中,因而行动一旦发生,人们就无法取消业已发生的事情,它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旦出发,就再也无法回头。行动过程的不可逆转性同时也意味着行动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不可逆转的行动一旦发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行动,用阿伦特的话说,就是“每个行动都造成反动(reaction),每个反动都造成连锁反应,从而每个过程都是新过程的起因。”^{[1]149}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封闭在一个圈子里,随着行动的展开,它必然溢出原先的范围,发生在不同的人之间的如此纷繁复杂的过程,要精确预测其结果自然是不可能的。行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的匿名性。行动的结果最终会被讲成一个故事,但是行动者却不是故事的作者或者制作者。看起来有点吊诡,但仔细想来却不难理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故事不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也不是由某几个人一起完成的,而是在一个人际关系网中由很多人共同完成的。每一个个体在行动中都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那些所谓的强者或超人,自以为没有他人的帮助和合作就能够独自创造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所以说,没有任何一个行动者可以独断地宣称自己是故事的制作人,故事的制作人只能是讲故事的人,就像特洛伊战争中的那些英雄们,经由荷马这个讲故事的人的手笔而永垂史册。

当然,上述的行动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具有开端、诞生性质的行动,而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可以预先经过计划然后实施的行动。而只要人们在开端、诞生的意义上行动,行动的上述三重困难就不会是外在的或者说可以消除的,而是内在于每一个真正的行动之中,一项行动,只要一开端,就像离弦的箭无法收回,其结果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无法预测,如果没有讲故事的人,它的结果也会倏忽而过、稍纵即逝。正是行动的这种深刻的灾难性,使得从行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事务领域与脆弱性命运般地绑在一起。于是乎,寻找对人类事务脆弱性的补救之道从有行动之始就一直与行动紧紧相随。

建立城邦是希腊人原初的、前哲学的补救之道。关于城邦作为补救之道,我们可以引用阿伦特的原话:“城邦,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们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虚无益的人类活动——行动和言说,以及最无形、最短促的人造‘产品’——作为言行结果的业绩和故事,可以变成永不消逝的东西。……它向有死的行动者保证:他倏忽而过的存在和稍纵即逝的伟大,不会失去来自被他人所见、所闻和一般地出现在同辈观众面前而获得的真实性。”^{[1]155}

然而,希腊城邦不可阻止的衰败,使得希腊人开始寻找一条哲学的道路来补救人类事务的脆弱性,那条路就是“以制作代替行动的尝试”。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制作或者说工作无需他人在场,从而制作者自己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在哲学上,这种尝试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最著名的“理念论”就来源于制作领域的经验。按照阿伦特对制作的分析,制作者要制作东西,先要有一个有待制作之物的模型,然后再按照此模型进行制作,这个模型在制作开始之前就存在,在制作结束之后也还在那里,比所有它可能促使其产生的使用对象更长久。制作领域的这一经验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柏拉图的学说中,高高在上的、统率着众多易逝事物的永恒理念,就是从模型的永久性和单一性中得到证明的,众多易逝对象就是模仿它们制造出来的。”^{[1]109-110}

相对于行动的脆弱性而言,制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内在固有的稳定性。因为它不像行动那样,始终需要依赖于他人的在场。技艺人可以在孤独的情况下,凭借一个模型的引导,就制造出一个有用品;同样地,当他觉得不需要时,他可以对它加以破坏。由此,技艺人成为了统治者和主人,不仅统治整个自然界,也统治他自身和他的行为。当人成为统治者之时,一切尽在人的掌控之中,脆弱性自然随之远去,稳定性和安全性自然随之而来。这一点体现在人类事务领域或者说政治生活领域,就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出现了的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各类政治共同体:一人统治或君主制,少数人统治或寡头制,多数人统治或民主制。也许民主制比一人统治要好一点,但是这只是量上的区别,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1]172}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也许哲学王能更合理地安排城邦生活,会好于其他类型的统治者,但是还是无法改变统治与被统治的事实。而一个人,一旦成为被统治者,就失去了在公共领域展示自己的机会,他作为人的独特性和卓越性也无法得到体现。

事实上,在哲学史中,还有一条对人类事务脆弱性的补救之道,那就是“如果人们只是声明放弃行动的能力,连同行动的空虚、无限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也许就找到了一种对人类事务脆弱性的补救之道。”^{[1]153}这条道路的典型代表是斯多葛学派,这个学派通过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的方式来克服脆弱性,貌似不行动为斯多葛学派赢得了自由,保留了个人人格的独立和完整,但是,在阿伦特看来,斯多葛学派只是停留在自由的幻觉上而已,因为在他们那里,只要灵魂是自由的,即使受奴役也无所谓。这种自由,只有在消解了世界以及活生生的人的现实性的基础上,在用一个想象的世界换取真实的世界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是如此坚硬地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之中,这是根本无法取消的事实。

无论是希腊的城邦,还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抑或是斯多葛学派的不行动,都说明了自有行动伊始,与行动的脆弱性相抗争也就开始了,而其中以制作代替行动的这条路子是最顽强的抗争之道,也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对人类事务脆弱性补救之道最有力的一种,可以说,这种思路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正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子。但是,在阿伦特看来,实际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实际事件并非是完全在人的掌控之内的,相反地,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在意料之外的。换言之,人类事务领域经常发生着不可预测之事,这可以说是人类事务领域的现实情况,如果无视这一现实,为了稳定、安全和高效,用制作去代替行动,其结果往往是不能如愿的。

当然,以上论述的只是用制作代替行动在人类事务领域中所产生的现实后果而已,在阿伦特的心目中,这一做法的真正要害之处,在于它对复数性的破坏,对公共领域的戕害。人的复数性被破坏了,人的数量还是那么多,但是万众如一人,通过行动和言说所能彰显出来差异性和卓越性根本无法得到体现;同样地,通过行动和言说所产生出来的公共空间的萎缩,使得人们失去了在其中展示自己的机会。

那么,阿伦特有没有提出补救人类事务脆弱性的道路呢?从哲学上分析,阿伦特提到了宽恕和承诺。阿伦特指出,“要把行动从它所开启的过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中解救出来,不能依靠另一种或许是

更高级的能力,而要依靠行动自身的一种潜能。对于不可逆性,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摆脱其困境的可能的拯救之道就是宽恕(forgive)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promise)的能力中。”^{[1]184}宽恕和承诺,一个面对的是过去,是对过去行为的斩断,以便能够扔掉包袱重新开始;一个面向的是未来,是对未来行为的一种约束,从而能“在不确定的海洋上建造一些安全的岛屿”。这两种行为,都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行动的内部,是行动自身所蕴含的一种潜能,所以,它们“仍然保有行动的原发特征”,具有行动所具有的开端启新的特征,从而使得行动有可能从那种无边的黑暗中走出来,使得人们对过去不会拘泥与执着,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阿伦特的视野中,好生活(good life)就是上述那种通过行动和言说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和卓越性的生活,这种“‘优良生活’(good life)(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生活)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优良的”,在于它通过掌控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以及通过克服所有生命动物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1]22}这样的生活也就是自由的生活,因为“自由,即完全从生存必需性和生存必需性所从出的关系中摆脱出来”。^{[1]35}这是阿伦特一贯的主张,她把积极生活分为三种根本的活动,即劳动、工作和行动。而“好的生活”只是在行动领域中才有可能,人的独特性和卓越性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得到体现。顺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在政治实践中阿伦特推崇“参与式民主”,希望公民都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在其中展现自己的独特与卓越。需要说明的是,并不能因为阿伦特对行动、公共领域、自由的强调,就认为阿伦特觉得劳动、工作或者私人领域不重要。在她那里,劳动和工作只是属于前政治领域的事情,不宜放到政治领域来讨论,阿伦特做的是划界的工作。就她所讨论的问题重点而言,对行动的强调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纳斯鲍姆提倡过一种欣欣向荣的好生活。在她看来,欣欣向荣的好生活是通过行动把潜在的美德实现出来,通过在城邦中过政治生活和与另一个人进入友爱关系来繁荣自己的人性。但是,这种好生活是与“脆弱性”相连的,那是因为无论是美德的实现活动还是政治生活和友爱,它们都与“运气”紧紧相随。

“运气”,是纳斯鲍姆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讲,它是指“人类行动者缺乏控制的事件”。^{[2]3}它既包括外在世界赋予我们的种种偶然境遇,也包括来自我们灵魂自身的非理性部分,诸如欲望、感觉和激情等不可控制的因素。在纳斯鲍姆看来,只要我们是在过一种人的生活,那么运气就会像空气一样伴随着我们。这是因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不自足性,他必须依赖于种种活动来丰富自己,依赖于他人来繁荣自己,就像葡萄藤的成长,必须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而这种对外在活动和他人的依赖,决定了人的生活必定时时与运气相伴随。

首先,好的人类生活是美德的一种实现活动,而不是品格的一种高尚状态。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一个人只要处于具有美德的状况或状态,他就能够过上好生活。到了近代,这种思想最典型地体现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康德始终强调出自善良意志的道德价值对于外部力量的自主性,即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是不可能受到外在力量影响的,换言之,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是否能过上好的生活,关键在于这种道德是否实现出来,而在于是否具有这样的一种品格的高尚状态,道德价值对运气具有免疫力。可以说,从古代到现代,这都是道德哲学中一个很有市场的传统。纳斯鲍姆显然是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她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指出:“对一个人来说,好的生活不仅要求好的品格状态,而且也要求实际的活动性。”^{[2]438}因为好的品格状态只是为好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只有通过活动实现出来,才能真正称为好生活。如果只是让品格处于不实现的状态之中,那么就是对好生活的一种切断;品格状态只有通过

活动实现出来,才能使得生活变得欣欣向荣。

毫无疑问,品格如果处于一种状态之中,它就不会受到运气的影响,自然是很安全,也与脆弱性无缘,但是,一旦要实现出来,它却无时无刻地受到运气的威胁,身体条件、社会环境条件、资源条件等,都会妨碍活动的实现,进而影响人的生活,因而与脆弱性紧紧相连。纳斯鲍姆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受到严刑折磨、受到奴役、身体健康欠佳、极度贫困、子女死亡等,都有可能使得一个人无法开展卓越的活动。

好的人类生活不仅是美德的一种实现活动,而且还包括“那些与公民身份和政治依附相联系的活动,以及那些涉及到个人的爱和友谊的活动”,^{[2]475}也就是政治活动和友爱。这两种活动,纳斯鲍姆称之为“关系性的善”,它们对好的人类生活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而且具有内在的价值。首先是政治活动,公民的活动以及一个富有养分的政治环境是发展和维护好品格的必要工具;而带有深厚情感因素的友爱使得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具有了动机和源泉。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给予“正义”和“友爱”以很高的地位,在城邦的政治活动中,正义是所有美德当中最有权威的,相当于“完善的美德”本身,它是一个城邦运行良好的硬性条件;而友爱,由于它所具有的那种情感性质,成为城邦良好运行的软性条件。光有“正义”城邦生活就只有冷冰冰的制度安排和建构好的秩序,缺少动力机制;或者光有“友爱”缺少制度安排和良好的秩序也无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共同体,所以两者缺一不可。而说政治生活和友爱具有内在的价值,纳斯鲍姆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指出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必然有父母、儿女、妻子以及朋友和同邦人,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因而不可能孤独地生活,“孤独的生活不仅不太完善,而且也缺乏一种非常根本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称为人类生活”。^{[2]485}这种“非常根本的东西”就是人必须生活在人群当中,否则我们就无法成为自己。基于这个基本的立场,政治活动和友爱就必须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选择,而不仅仅是从工具的意义被选择。

与美德的实现活动一样,政治活动和友爱这种关系性的善要得以实现,同样会受到运气的影响,而且,美德的实现是美德的状态加上活动,而政治活动尤其是友爱,“不只是一种爱的品格状态加上一个把它激发出来的合适情景”就足够的,它还依赖于他人的存在,换言之,他人与你的交流与他人对你的回应应在“关系性的善”的实现过程中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如果剥夺了这些东西,也就没有什么被称为政治活动或友爱的东西了。这种对他人存在的本质性需要,使得政治活动和友爱相较于美德的实现活动而言更加脆弱。

纳斯鲍姆以友爱为例来说明这种脆弱性,在纳斯鲍姆看来,“爱,就其本质而论,是与一种独立的、外在的东西的关系。”^{[2]491}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值得看重的被爱者被发现;其次是这个被爱者必须接受你的爱,能与你相互交流、相互分享;再次,相爱的人必须“生活在一起”,即“最好的朋友‘在一起打发日子’”,“通过有规律的、亲密的结交来透彻地体验对方的品格和习惯。”^{[2]496}这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在友爱中的发生都非常罕有,而任何一个步骤的中断,都意味着友爱的不可能。即使一个人很幸运,发现了被爱者,被爱者也接受了你的爱,相爱双方也“生活在一起”了,你也不能保证在漫长的生活中一直能够彼此信任、不怀疑、不嫉妒,即使品格的改变、身体的衰老等等也不改变这种爱。所以说,爱是脆弱性如影相随的,它太脆弱,所以它的实现也就显得特别美好!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脆弱性是与我们的生活如影相随的,脆弱性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因此,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与“运气”做斗争,以消除人类生活的脆弱性也就一直存在。这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无视生活中运气的存在;一种就是努力排除运气对生活的左右。前者声称:“与生活得好的一切因果因素都处于行动者坚定的把握之中;外在的不受控制的事件既不能有意义地强化好的生活,也不能有意义地削弱好的生活。”^{[2]439}此一思想的典型代表就是把欣欣向荣的好生活确定为品格的一种高尚状态,比如斯多葛学派,在他们那里,一个人哪怕受到奴役、监禁甚至折磨,只要他拥有美德,他就与一个活动没有受到妨碍的人那样,过着好的人类生活。而排除运气对生活的左右的代表则是柏拉图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柏拉图主义者。在柏拉图主义者看来,感性的东西具有太强的偶然性,它

是不稳定的、短暂易逝的,无论是那些外在环境等感性条件还是人自身的感性欲望都是如此。因而他们只承认理智的沉思活动才是好生活,他们通过充分地发展人的理性力量,直接面对言语和思想,祛除任何感性的羁绊,从而摆脱了运气的左右,过上自足完美的生活。但是在纳斯鲍姆看来,好的人类生活不是一种孤独的自足性,而是要在人群当中繁荣自己、实现自己。柏拉图主义者通过摆脱运气的左右避免了生活的脆弱性,但是这种似神的生活,这种“超越人性”的愿望,不但不是好的人类生活,甚至不能被称为人类生活。柏拉图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祛除脆弱性,但是却陷入了另一种脆弱性,因为理性要求我们祛除任何感性的因素,但是作为有欲望和有需求的存在者,理性的这种要求是极难达到的,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需要写一部《理想国》,在其中精心设计培养“哲学王”的教育体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育体制几乎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生活与运气不可脱离,也与脆弱性紧紧相连。那么,面对这种根本上的脆弱性,我们人类是不是只能坐以待毙?抑或是能做点什么事情?关于这个问题,纳斯鲍姆是从两个层面上来回答的。第一个是本体论层面的,脆弱性就像是人的命运,只要过的是人的生活,就必然与脆弱性相连。但诚如她所言,“人,唯其脆弱,才有力量,才有美,才有卓越和高贵。”换言之,正是因为人生与脆弱性相连,才需要通过自己的志愿行动去对抗这种脆弱性,在这个过程中,美德才得以体现,人性才得以成长,生活才得以繁荣。如果人生活在一个没有短缺、没有冒险、没有需要、没有限制的安全的环境中,这种似神的生活自然与脆弱性绝缘,但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大多数核心的人类价值都没有价值,甚至变得不可理喻。”不仅如此,这样的生活也是极其无聊的,所以,在《奥德修纪》中,当爱上奥德修斯的卡里普索愿意为奥德修斯提供没有悲伤、没有危险、没有牺牲的永恒不朽的生活时,奥德修斯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拒绝,选择了人的生活,那种生活不仅是冒险的和困难的,而且是确定要死的。但是他所选择的生活也蕴含了卓越的可能性、丰富的可能性,蕴含了书写自己的历史的可能性。如果说奥德修斯选择跟卡里普索在一起,他的故事也将随着“从此他们幸福地在一起”而结束。第二个是操作层面的,纳斯鲍姆要回答的是,虽然“脆弱性是某些人类真正的善的一个必要背景条件”,它与人的好生活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但是有些脆弱性却是可以避免的。纳斯鲍姆指出:“如果我们恰当地思考人类生活中的脆弱要素,那么我们会看到,人类很多脆弱性并不是来自人类生活本身的结构,不是来自某种神秘的自然必然性,而是来自无知、贪婪、恶意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癫狂。”^{[2]27}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由于无知、贪婪、恶意等原因所造成的脆弱性,是可以某种方式加以避免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把我们在这种脆弱性的必然性中解脱出来,并且看到变化的希望。具体而言,可以从教育和政治规划两个角度入手来避免这种人为的脆弱性。在教育方面,纳斯鲍姆提倡一种“世界公民模式”的人文教育,这种教育通过重新发掘苏格拉底和斯多葛学派的相关思想,提倡教育平等、提倡多元文化教育、强调理性批判能力的培养,其最高目标则是指向人性的培养。^[3]而在政治规划方面,纳斯鲍姆提倡“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2]818}她通过继承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提出了十种人类的基本功能,即:生命;身体健康;身体的完整性;感觉、想象和思维;情感;实践理性;人际关系;其他物种;玩耍;对环境的控制。^{[2]826}在这里,纳斯鲍姆认为应该让每一个人类存在者的这十种人类基本功能得以充分的实现,以此来检验一个社会的政治规划是否正义和公正。通过教育和政治规划,来避免由于人性的弱点而造成的脆弱性,从而让人过上一种欣欣向荣的好生活。

三

阿伦特和纳斯鲍姆不约而同地对“脆弱性”问题予以了关注,这一关注的深层指向都是欣欣向荣的好生活,那种与他人在一起的政治生活,在阿伦特那里,这种生活体现在人类事务领域,在那里,人的独特性

和卓越性得以展示;在纳斯鲍姆那里,这种生活实现于“关系性的善”之中,在那里,人性得以繁荣,自我得以生长。虽然这种好生活与脆弱性须臾不可分离,但却还是我们值得为之追求的生活!

但是两人思想的理路是不同的。在阿伦特那里,“脆弱性”是由行动所面临的三重困难而带出来的;而纳斯鲍姆的“脆弱性”则是由运气所引出来的。这在文章的前面部分已经详细论述过。结合两人的思想,我们发现虽说理路不同,但两人的思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相互补充,从而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阿伦特探讨了行动的三重困难,但没有继续探讨行动为何会有这三重困难。这一点,纳斯鲍姆的理论可以从一个角度加以回答。纳斯鲍姆指出我们作为人,作为有着沉重肉身的有限的人,始终无法像神一样可以是自足的,而必须倚赖外在于我们的许多东西。这是一种本体论的亏欠,这一亏欠,注定了人必然要受到“运气”的影响,就是那种“人类存在者缺乏控制的事件”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也就是人的生活脆弱性。放在阿伦特的理论中,就是行动的不可逆转性、行动后果的不可捉摸性,从而导致人类事务的脆弱性。总之,我们可以用人的有限性,进而受到运气的影响这样一条思路来试图丰富阿伦特的行动理论。

同样的,阿伦特的思想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补充纳斯鲍姆的理论。纳斯鲍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感性和理性的二分,理性主义是如何通过祛除感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条思路。对于理性主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并没有进行深究。阿伦特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分析,指出把“行动解释为制造或制作这一更为可信的解释方式”,使得柏拉图最终完成了他的理念论。这一分析,可以对理性主义的产生根源有更深入的了解。

综观两人的思想,可以发现尽管路径不同,但两人都对理性主义最深沉的动机进行了批判。理性主义最深的渴望,就是使人过上一种稳定的、确定的生活,“事实上,从人类事务的脆弱状态逃避到安宁有序的稳固状态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自柏拉图以来的大部分政治哲学都可以轻易地被理解为:为彻底逃避政治寻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的各种尝试。”^{[1]173}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的,以制作代替行动,从而把工作和制造内在固有的稳定性赋予人类事务领域。那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最核心部分——理念论。而把理念论用于政治目的,就是“统治”概念的出现,用永恒的理念作为标准来衡量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言行,使得人们变化多端的言行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些人按照永恒的理念发命令,另一些人被迫服从命令,于是统治的概念由此出现。换言之,用制作代替行动,进而在政治领域采用统治的原则,其最深的渴望还是在于要克服人类事务领域的脆弱性。

而在纳斯鲍姆看来,柏拉图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要应对人类生活由于受运气的影响而产生的脆弱性。柏拉图的做法就是通过哲学这种技艺,尽可能地祛除欲望等这些感性的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欲望会把灵魂非常迅速地引向很脆弱的事物,从而使灵魂顷刻间忘掉了它所珍视的价值。”^{[2]182}换言之,欲望等感性因素容易产生不可控制的因素,而这种不可控制性进而使得生活不完全,让生活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偶然性和不稳定性是不应该在人类的价值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理性主义希望把人类生活从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当中拯救出来,既然偶然性和不稳定性是从情感和欲望等这些感性因素中产生的,那么这种拯救就需要尽可能地贬抑对情感和欲望的追求,通过把每一对象看成是同一的和可通约的从而是可替代的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看到一个身体时所感受到的美和证明一道数学难题时所领悟到的美在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取消了爱的意义。他们通过与纯粹的理念这样一种不需要在物理上存在的东西打交道,过上沉思的生活,以达到它的自足性和稳定性。总之,祛除了感性缠绕的人,就变成了一个自足和完全的人,没有害怕、没有悲伤,远离一切偶然性和不稳定性。柏拉图就是通过这种可通约性和可替代性祛除掉感性因素对人的羁绊,从而“排除或者至少降低激情那令人烦恼的力量。使我们的生活免于运气的摆布,就是要使它们免受不可控制的危险的内在根源的攻击。可通约性和普遍性都对追求这个抱负做出了贡献:因为使欲望的对象变得可通约,就是要消除我们对它们强烈情感的根源;把

它们视为一个普通事物而非不可取代的特殊事物,就是要改造爱、恨、悲伤这样的情感,以便削减它们的破坏性力量。”^{[2]422}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无论是阿伦特通过分析柏拉图的理念论来源于以制作代替行动的经验,还是纳斯鲍姆提出的理性主义对运气的排除,都体现了理性主义对确定性和安全性的渴望,这种渴望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渴望。面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面对风云莫测的人类事务,每每感到生活的脆弱性,面对这种脆弱性,灵魂总是会不安和恐惧,总是会倦怠和疲惫。于是,一颗心是如此地渴望安定。如果把人的生活安放在理性的控制和监督之下,生活就会归于安宁。但是,理性主义对稳定和有序如此的孜孜以求,一方面体现出他们克服脆弱性的巨大决心,但同时也反过来说明了脆弱性之无所不在,无论是阿伦特的分析,还是纳斯鲍姆的论述,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在阿伦特那里,行动是复数性的人之为人的本体论存在方式;在纳斯鲍姆那里,运气是有限的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回避的命运。所以由行动带出来的脆弱性和由运气所引发的脆弱性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脆弱性是否存在,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每天发生的成千上万的无常之事,都在提示着这个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面对这种脆弱性,是回避它,直面它,还是超越它?回避它的最典型代表是斯多葛学派,这一点,阿伦特和纳斯鲍姆都有过相应的批判,前文中也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超越它,则是理性主义的做法。而它这样做,在阿伦特看来,“与其说它立足于对人的蔑视,不如说它立足于对行动的怀疑,并且出自于为行动寻找一个替代品的强烈渴望,而非出自于任何不负责任的或专横的权力意志。”^{[1]173}也就是说,用制作的稳定性代替行动的不可预测性,是理性主义超越脆弱性的方法。纳斯鲍姆也指出,柏拉图的思想“是对同样的人类困境的响应,也是对同样的人类征服困境的雄心的具体表达”,而且是一种“对人类进步更大胆、更一心一意的追求”。^{[2]113}纳斯鲍姆把理性主义的这种冲动看成是“超越人性”的愿望,但在纳斯鲍姆看来这种愿望只适合没有欲望的、天使般的存在,而不适合有血有肉的、有限的人类存在者。而阿伦特和纳斯鲍姆所做的理论努力,就是要直面好生活所面临的脆弱性,我们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就是阿伦特和纳斯鲍姆的这种努力。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阿伦特通过对行动的张扬进而希望在人类事务领域展示人的独特性和卓越性,以及纳斯鲍姆通过对运气的阐发进而提出通过“关系性的善”过上一种欣欣向荣的好生活,都是源于对理性主义霸权的反抗。理性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且人的理性生活是人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维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纳斯鲍姆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过理性的重要性,理性的自我省察能力的培养是她教育哲学始终关注的目标。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把这样一个维度当成全部,当成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而把其他的维度都当成理性的附庸品,需要的时候拿来说事,不需要的时候弃之如敝屣,这样一种单向度的发展绝对是存在着很大隐患的。尤其是当这一理性更加极端地变成一种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的时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敏锐的思想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已经进行了或者正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阿伦特和纳斯鲍姆,虽然不是专门批评理性主义,但是通过她们关于好生活和脆弱性的相关论述,我们也能体会到其中隐含的这一层含义。

事实上,作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类个体,是一个有多种维度、多种可能性的个体。如果生活只有理性和静止这一维度,就堵塞了人类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人的生活也将变得干瘪、单调和无趣。希腊神话中有代表理性的阿波罗和代表感性的狄奥尼索斯,希腊哲学亦有主张静止的德谟克利特和主张流变的赫拉克利特,这就说明了自有人类伊始,人就一直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摇摆,确定性让人的生活安定,让人有家园之感;不确定性让人的生活充满可能性,让人产生希望和恐惧。人就是在这种张力之间不断挣扎、不断成长,最终才有可能过上欣欣向荣的好生活,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

总之,无论是阿伦特还是纳斯鲍姆,其理论有诸多可对话之处,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对“好生活”的政治构想亦不同。1933年纳粹在德国取得政权之后,阿伦特成为辗转来到美国的德国移

民学者之一。作为德裔犹太学者,阿伦特带着自己祖国和欧洲大陆的教育传统,在战后选择了留在美国。这样的经历,使得她“一直是介于两个不同世界中的知识者公民,不充分,也不明确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他们已经不再是德国人,但却又没有简单地就变成了美国人”,她是美国民主社会的“外乡人”。^[4]阿伦特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使得她对“好生活”的设想更多地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好的生活体现在积极参与的公民政治中,在其中通过言行展示个人的独特性。这就是阿伦特所推崇的“参与式民主”,这一设想与美国民主社会的日常政治相比要“高尚”得多,因而事实上也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状况的不赞同,体现的是一种精英政治理想。

而纳斯鲍姆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没有任何怀疑。与精英主义的政治观不同,她孜孜以求的是每一个人类个体的权利,她提出了“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人类核心能力清单(即上文中提到的十种人类的基本功能),提出了一个基于一套规范性政治原则的社会正义理论,这个政治原则应该是被包含在法制层面上的。她引入了“能力安全”的概念,能力安全就是指保证人们有能力使用和享受纳斯鲍姆人类核心能力清单上的能力的安全;保证能力安全涉及到政治程序和政治构架。通过设计一套政治程序和构建,以实现她对自由主义根本观念的承诺,那就是:每一个人类存在者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关怀。这也就是她心目中的“好生活”。与阿伦特相比,纳斯鲍姆的政治构想更加的务实。

当今的世界瞬息万变,就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5]人们普遍地感到脆弱性与生活是如此紧密地相联,继而产生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在这种背景下,阿伦特和纳斯鲍姆关于“好生活与脆弱性”的思想,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对于这个弥漫着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社会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激励意义。而无论是阿伦特精英主义的“参与式民主”,抑或是纳斯鲍姆实质性的社会正义理论,都给了人们以信心和行动的指引。

参考文献:

- [1]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 玛莎·纳斯鲍姆. 善的脆弱性[M]. 徐向东,陆萌,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 [3] 叶晓璐. 世界公民与培养人性——纳斯鲍姆教育哲学思想初探[C]//现代外国哲学:第2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36-438.
- [4] 徐贲.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

Good Life and Fragility

——Analysis on Thoughts of Arendt and Nussbaum

YE Xiaolu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 good Life is always a topic discussed in ethnics. Arendt thinks a good life is to show uniqueness and excellence by means of action and speech in the realm of human affairs, while Nussbaum believes that it fulfils potential virtues by means of action, live a political life in polis and flourishes his nature by having philia with others. However, more often than not a good life is related to fragility, which, for Arendt, comes from the threefold frustration of action; while for Nussbaum, it is affected by luck. Their concern about this topic originates from the critique of deep motive of rationalism. Undoubtedly, their thoughts have great inspiration for our time which is full of widespread pessimism and nihilism.

Key words: Hannah Arendt; Martha Nussbaum; a good life; fragility; action; luck

(责任编辑:黄仕军)